

编者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今年的11月8日是第24个中国记者节。在记者节来临之际,本报推出央媒报道范长江、邹韬奋、穆青三

位新闻前辈的文章,以此缅怀他们的革命事迹和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激励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记“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以杰出新闻前辈为榜样,将镜头对准基层、笔头贴

近群众,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断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讲好临夏故事、传播临夏声音,树立临夏形象。

## 杰出的新闻战士范长江

●宋守山

加群众活动被驱逐,不得不前往当时的大革命中心武汉。

在武汉,范长江加入了贺龙任军长的革命军第20军学兵营,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过程中,他与部队失散,伤病交加的范长江甚至被收尸人误以为去世。

此后,他欲“从读书中找出路”,于1928年夏天前往南京,考入中央党务学校。在校期间,他的思想逐渐从旧三民主义转向社会改良主义,并加入了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范长江对国民党在国土沦陷后的不抵抗与“漠然置之”态度深感失望。当时,中央党务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加入国民党,而范长江觉得“加入国民党,是奇耻大辱”,最终决定与国民党决裂,另外找出路。他换上学校发给的衣物,丢下国民党党证,愤而离开学校,“身上不再保留国民党一点东西”,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2000年,我国将每年的11月8日定为记者节。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等左翼新闻记者于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忆西蒙》等作品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名篇,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也成为我国新闻记者的最高奖。

“身上不再保留国民党一点东西”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长江是其投稿时所用的笔名,并以此行世。范长江中学即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1927年就就读于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时因积极参与

“中国的出路,在我看来,是找到了”

1932年秋,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年开始为《北平晨报》等撰稿,由此走上新闻道路。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京津两地日军横行,范长江意识到“原定的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他“很想把自己所见报告出来,提起国人的注意”,这是他成为新闻记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范长江主张记者要有抱负,“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当时的问题有两个,那就是红军北上后中国的动向以及抗战后西北的状况。为回答这些

问题,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自天津只身北上,经青岛、上海至重庆,而后自成都出发,经兰州、入祁连山,历时十月有余,足迹遍布五省,行程一万两千余里,撰写通讯百余篇,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考察。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早于斯诺《西行漫记》至少一年,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了解。

为深入了解陕北状况,范长江请求赴延安采访并获批准。1937年2月9日,范长江到达延安,当晚受邀在毛泽东的窑洞做“莫夜之谈”。这次长谈涉及“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重要问题。1969年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称,“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大问题全部解决了”,并欣喜地表示“中国的出路,在我看来,是找到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范长江放弃写书计划,自西安返沪,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他不仅在《大公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通讯,还在《国闻周报》连载通讯《陕北之行》。《陕北之行》发表时恰逢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范长江的通讯令与会人士大为震撼,也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为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和胡愈之、夏衍等一批左翼记者建立了爱国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史称“青记”,即中国记协的前身。次年3月,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于汉口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范长江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秋,范长江拒绝了《大公报》经理胡政之为其配备记者、专车、电台,但要“放弃拥护中共态度,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的要求,愤而离开《大公报》并与其代表的阶级决裂。

开创新中国新闻事业

离开《大公报》后,范长江开始了在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生涯。他创办通讯社、报纸,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范长江于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是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后在香港参与创办《华商报》并任副总经理。香港沦陷后,他转道桂林、上海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筹办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及《新华日报》(华中版)。为了培养新闻人才,还推动成立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任校长。

1946年6月,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四军到达南京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是中共对外新闻发言人之一。11月,范长江回到延安,任新华社副总编辑。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范长江率领新华社总社40多人的工作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这一时期党中央的主要社论和新闻皆由此发出,传遍全国的红色声音对推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范长江不仅经手编发过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文章,更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万大军,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这些成为其一生“最宝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前,范长江领导创办了京沪两地的党报。1949年1月31日,范长江带领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分社人员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华北日报》及广播电台,并在两天内正式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也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4月底,他作为南下干部进入上海,出任上海军管会文化教育副主任,兼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11月,范长江由沪返京,出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第二年1月,他接替胡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得到平反,被评价为“杰出的新闻战士”“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建和发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人民网)



穆青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1966年

2月7日,新

华社播发穆青和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动人的事迹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随着一份份报纸传遍大江南北,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形象,鲜活地矗立于天地之间,铭刻在人民心中。

这篇稿件的诞生,源自1963年12月穆青和新华社记者冯健的一次中原之行。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自1961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复苏时期。

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脑海中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该怎样将蕴含于人民之中那种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神,通过新华社的报道,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为了能找到一个突破口,穆青决定到自己熟悉的故乡河南去。这片土地历史上就是一个饱受水旱灾害的地方。他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新闻素材。

到河南后,根据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摸到的线索,穆青得知,在豫东兰考县有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开展除‘三害’斗争活活累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兰考是一个古城,连年不断的沙荒、盐碱、内涝、水灾使兰考成为豫东重灾区中的“黑锅底”。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来到了兰考县委大院。大院里有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地而生,爬上墙头、窗台,红砖墙被盐碱侵蚀得斑斑驳驳,有的地方成了白粉。

尽管对这位县委书记的事迹已有所耳闻,也看了当时报纸的一些报道,但穆青还是被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深深震撼。

“那晚下大雪,我看见焦书记房间里的灯光亮了一夜。大清早他挨门把我们干部叫醒,干啥?他说快去看看老百姓,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一天焦书记硬是忍着病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了九个村子……”

“焦书记家里也困难,没条像样的被子,烂得不行了翻过来盖。我们县里补助他三斤棉花票,他就是不要,说群众比他更困难……”

“他后来被查出肝癌,都不行了,还在床上念叨,张庄的沙丘,赵垛楼的庄稼,老韩家的泡桐树。临死前还要我们去拿把盐碱地的麦穗给他看一眼……”

“焦书记得病的消息传开后,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里去看看他。后来焦书记的遗体运回兰考,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扳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地喊:‘回来呀回来……’”

听着这些故事,抚摸着焦裕禄留下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穆青悲恸得不能自持,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穆青一行访问了几十位基层干部和群众,走到哪,群众都饱含热泪叙说着焦书记。又亲眼看了焦裕禄带领群众挖的沟渠、封闭的沙丘群后,穆青对冯健和周原说,“焦裕禄就是一代共产党员的典型!我们一定要把他的事迹原原本本写出来,让人们看看咱们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舍生忘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他们对这篇报道反复推敲修改,先后七易其稿。稿子基本完成后,穆青又让周原把稿子带回兰考,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朗读征求意见,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名外,大家表示事实准确。

1966年2月7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各地,震撼了千千万万颗心灵。

焦裕禄顶风冒雪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向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震撼人心的一个场面描写,也是穆青自己内心的写照,对人民的热爱催促着穆青的脚步不停地走向群众,走向基层。

穆青从16岁离开故乡奔赴抗日前线,到60余岁任新华社社长,在历经沧桑的革命和新闻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人民的伟大和可爱。

穆青曾说:从我个人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在群众中间、在采访对象中间,在那些先进人物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是他们给了我很多营养,是他们教育了我,鼓励了我。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上。是人民哺育了我,并给我以前进的动力。

穆青时常告诫年轻人要“勿忘人民”。他的一生都热爱劳动人民,他的心始终同人民相通。

从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到蓬勃奋进的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年代,穆青始终敞开心扉,去感受可爱的祖国、可爱的人民;从一名年轻记者到新闻界巨擘,他始终孜孜以求,来一篇篇名篇力作作为时代鼓起精神之帆。(据新华社视点)

## 中国新闻奖简介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

中国新闻奖的创办始于1989年开展的“现场短新闻”评选。1990年中国记协在逐步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新闻界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方案,明确了中国新闻奖的定位——全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

此后,将由中宣部主办的“新闻名专栏奖”、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举办的“全国新闻摄影年赛”等,合并、纳入到中国新闻奖评选,使中国新闻奖成为综合多个全国性奖项的评比活动,也成为经中央批准的唯一一项综合性的优秀新闻作品奖。评选项目、设奖数额等也随新闻事业发展而逐步递增,2018年中国新闻奖首次设立媒体融合奖,2019年调整为目前的29个评选项目、350个奖项。评选范围广泛覆盖全国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基本囊括了新闻媒体主要作品形态,是全国新闻界编辑记者参与度比较高的评比活动。

## 长江韬奋奖简介

长江韬奋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范长江新闻奖创设于1991年,韬奋新闻奖创设于1993年。2005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精神,合并为长江韬奋奖。2005年至2010年,每年

评选一次;2010年至今,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20名获奖者。其中长江系列10名,主要奖励优秀记者(主持人);韬奋系列10名,主要奖励新闻编辑、新闻类节目制片人、校对等新闻工作者。(据中国记协网)

## “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

●李舒

的办刊思想。《生活》周刊原仅印一千余份,1929年销数“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

《生活》周刊坚持爱国进步立场,这在其评论中有鲜明的体现。从1927年9月25日即第2卷47期起,《生活》周刊于首页设立“小言论”专栏,由邹韬奋亲自主笔。这一专栏自创办至1933年7月他受到暗杀威胁被迫出国流亡,从未间断,共刊发小言论417篇。1931年9月26日,“本周要闻”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并刊发4篇小言论,号召国民抗日救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趋向》等大量进步言论,阐述抗日立场,鼓舞军民斗志。周有光称,这本杂志“唤醒了—代青年”。

《生活》周刊时时立于时代前列,邹韬奋亦自言论而渐入行动。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亦在暗杀名单中。在好友力劝之下,邹韬奋出国暂避,他将此次流亡视为“代表读者诸友的耳朵眼睛”的考察,足迹遍布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等国家。两年的海外漂泊,邹韬奋写作《萍踪寄语》三集,加之回国后在苏州看守所所作的《萍踪忆语》,他用四本书记述了所见所思。这段经历使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做出了“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判断,提出“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立场、观点转向马克思主义。

邹韬奋流亡后不久,《生活》周刊即遭国民党政府查封。1934年2月10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杜重远续其精神,再办《新生》。1935年5月,《新生》因《闲话皇帝》一文引发日方挑衅和武力威胁。6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杜重远入狱。邹

韬奋得知此事后,于1935年8月回国。

1935年11月16日,“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的《大众生活》创刊,发行量一度到20万份,创当时中国刊物发行纪录。《大众生活》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36年2月,《大众生活》在出版16期后被查禁,罪名为“鼓吹民众武装抗日”。3月,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

1936年11月23日深夜,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得以无罪获释后,邹韬奋积极筹办新刊。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上海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办刊,陆续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和《抗战画报》六日刊等宣传抗战救国的进步刊物。《全民抗战》销量一度突破30万份,再创当时刊物发行纪录。除了办刊,他还组织生活书店出版了千余种进步书籍。生活书店最多时拥有56个分店,国民党亦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邹韬奋认为这一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抗战时期,邹韬奋曾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统区和国民党政治斗争更为有利。邹韬奋组织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不仅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更唤起民众巨大的爱国热情,把大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有裨益于中国革命。

“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办办办十分注重依靠群众。1936年,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缺乏办报资金,就将办刊宗旨、编辑方针、经营办法等公布,向读者招募股款。由于“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很快就筹集了大量股款。后来,《生活日报》更名《生活星期刊》迁往上海,他又提议“建立全国通信网”,吸纳全国读者担任通讯员供稿,这样就能“记录全国生活状态和解决生活上一切问题”。

对于群众,邹韬奋“常感觉的只是自己的渺小,大众的伟大”。1937年出狱后,他说:“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没有背叛大众,

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也只求‘心安理得’,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的爱国报刊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恼怒。自1939年4月起,生活书店各分店被迫停业,经理一级有40余人被捕。1941年2月25日,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政府参政员职务,秘密离渝赴港。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在港创刊。邹韬奋不仅忙于编务,还撰写专栏连载《抗战以来》,“以一个平凡记者的姿态”,记录了在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亲身经历,以“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在港复刊,邹韬奋任主编。邹韬奋办刊的经验就是抓社论和读者来信这“一头一尾”。《大众生活》最盛的时候一个月收到一万多封信,需要4个人同时专门负责拆信与抄信。邹韬奋称读者来信为“本刊真正的维他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阅读来信和回信,其热情“不逊于写情书”。

“吾党的光荣”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邹韬奋随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队驻地。此时,他已遭到国民党密令通缉。11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安排下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不久因耳疾复发返沪治疗。

患病期间,邹韬奋坚持写作。他在《对国事的呼吁》中记述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看到了“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究入党,遗嘱希望妥送延安”。9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究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11月15日在延安举行的邹韬奋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据人民网)

●王思北